

唐太宗集

吴云 冀宇 编辑校注

64682

24242

唐太宗集

吴云 冀宇 编辑校注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本书为高等院校古籍整理
研究补助基金资助项目。

唐太宗集

吴云 冀宇 编辑校注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开本 1/32 印张 16.125 插页 7 字数 350,000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300

统一书号：10094·523 定价：(精)5.35元



唐太宗像

新蜀阿婆療療俗
神古之不舊今亦不
濱滄之靈水吐岫標
盤散之秀岳橫基渭
勒芳碑乃銘銘曰

唐太宗溫泉銘

德無以罄化是知
功侔分禋并禁之
度弘彰道洽留崇
傳芳之跡斯在惟

唐太宗晉祠銘

序

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又是具有一定成就的诗人、文学家，是封建王朝的英明君主。在农民起义推翻隋朝的基础上，他统一全国，创建唐朝。在他的统治期间，政治稳定，经济发展，民族关系协调。贞观之治为文明昌盛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。他是汉族地区的天子，又是边疆各族的“天可汗”，他的名声远闻亚洲各国。是当时“国际”上的著名人物。

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，自他死后至今一千三百多年来，古今中外、史官、学者、各色人等，不知发表过多少评论了，本集编者的《前言》又对他的业绩功过给以全面的概述。在我的印象里，评介唐太宗的政治表现、经济措施、军事才能、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很多，而关于他在文化建设和文学成就方面的评介文章则较少，甚至少得与前者不成比例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一方面，历史学者总是注重政治经济问题而忽略文化问题，文学史家则多半以唐太宗的文学

成就不及其他著名作家高而不予重视；另一方面，也由于过去人们接触的有关唐太宗的材料多半是从史书上得到的，而关于唐太宗自己的著作则接触较少或根本没有接触。这是一个缺陷。由于这一缺陷，人们对于唐太宗的认识就不够全面：即只知道唐太宗的外在表现，而对他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则不甚了了。本集的《前言》中，对唐太宗在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方面的业绩给以较多的评介，这对读者是很有用的。

我觉得，唐太宗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和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，在封建帝王中可说是独一无二。历代开国皇帝，多以马上得天下，武功可观而文治不足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汉高祖轻侮士人，虽然他们在历史上也有一定贡献，但在文化建设方面却无可称道或负有罪责。其原因或由于厉行专制统治，实施愚民政策；或由于本人不学无术，不知文化为何物。唐太宗则不然。他半生戎马而留心经史，日理万机而注意文翰。他通经明史，能写文章，能作诗赋，还能写一笔好字，不愧是一名文化战线上的多面手。在他的倡导下，唐朝不仅是一个经济军事大国，也是一个学术文化大国。当时东亚各国和高昌、吐蕃诸族到长安留学的，就有八千多人。真是济济洋洋，盛况空前。这说明，唐太宗不仅有恢阔的政治胸怀，卓越的军事才干，也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。正是有这样的文化修养，使他有才有识，能统率三军、驾驭群臣、君临天

下。欧阳修在《新唐书·太宗纪赞》上说：“盛哉，太宗之烈也！其除隋之乱，比迹汤、武；致治之美，庶几成、康。自古功德兼隆，自汉以来未之有也。”虽然称誉备至，但对唐太宗的文化修养和成就方面，依然未着一字，使人感到有些欠缺。

《唐太宗集》的编辑和出版，弥补了这一欠缺。在本集中，读者可以看到唐太宗亲自撰写的诗赋和文章。读他的诏令（可能由文士代笔但经他修订同意），可以知道他怎样处理政治经济国计民生大事；读他的史论，可以知道他怎样评价古人；读他的《帝范》，可以看出他的政治见解……而读他的诗赋，更可以了解他的思想情操，窥见他的内心世界。这样，对唐太宗的认识就比较全面和深刻了。单凭史书的记载了解唐太宗，总是间接的、片面的，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；而读他本人的著作，则是直接的、比较全面的，所谓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，倍感亲切。它不仅为史学家作第一手资料用，也可供古典文学研究者阅读欣赏和作文学史资料用。

唐太宗的诗文散在各书，明代刊刻的《唐太宗皇帝集》很不完备。此次吴云和他的爱人冀宇同志积数年之力，广搜博寻，终于整理出比较完整的集子。其工作之艰巨，用力之勤奋，可以想见。在本集中有校勘，有解题，有注释，有系年，有标点，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他们的注释很详尽，更可贵的是，对于

不易理解的词句，径书“未详”，既不强作解人，也不回避矛盾，不予标出。这种“不知为不知”的实事求是的作风，是应该提倡和赞扬的。

我很高兴这部文集的出版。我相信，它一定会推动学术界对于唐太宗的深入研究，有助于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，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。故乐而为之序。

杨志玖

1983年4月20日

前 言

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他在文化建设方面也有不可泯灭的功绩。

一

唐太宗的英雄业绩首先表现在为统一大业而进行的战争方面。隋炀帝是著名的暴君。他即位后，大兴土木，营建东都洛阳，继而开掘运河，修筑长城，开辟驰道。尤其是在他晚年时，屡次发重兵侵略高丽。全国各地人民忍受不了此种残酷的剥削和繁重的徭役和兵役，纷纷举行起义反隋。这时，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分化，各地的地主、富豪乘机割地称雄。李世民的父亲李渊于大业十二年（六一六年）任太原留守，十八岁的李世民看到起兵反隋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便于大业十三年（六一七年）果断地杀了隋炀帝的亲信、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，揭起了反隋的义旗，从此开始了他的战争的生涯。在唐王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，曾有过三次较大的战争，而这些战争的全胜，都是在李世民亲自指挥下取得的。

首战陇右的薛举、薛仁果父子，这是李世民第一次指挥的大规模战争。大业十三年（六一七年）金城郡富豪薛举据郡起兵，称“秦帝”，都兰州，后又迁都天水，占据了陇西全境，拥兵

三十万。武德元年（六一八年）七月，唐军与秦军交锋于高墟（今陕西长武县北）。李世民由于轻敌和急躁而败北，秦军乘胜向唐境进攻。不久，举死，其子仁杲继立。薛仁杲据折墟城（今甘肃泾川县东北），继续进攻唐军。李世民总结了前次失败的教训，始则坚壁不出，待秦军粮尽人疲时方大举出击，薛仁杲被迫出降。

唐军遇到的另一个劲敌是刘武周。他占据了雁门、楼烦、定襄等郡称帝。武德二年（六一九年）曾击败唐军，李元吉弃太原归长安。这时李渊慌了手脚，想要放弃黄河以东的土地，专守蒲津关以西，从而保卫关中。在此关键时刻，李世民挺身而出向李渊呈表说：“太原王业所基，国之根本，河东殷实，京邑所资。若举而弃之，臣窃愤恨。愿假精兵三万，必能平殄武周，克复汾、晋。”（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上》）李渊接受了他的意见，派他进讨刘武周。李世民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，指出敌方“士卒虽众，内实空虚，意在速战。我坚营蓄锐，以挫其锋，粮尽计穷，自当遁走。”（同上）当敌人力疲之后，经过几番较量，于武德三年（六二〇年）大败刘武周，武周逃突厥，唐军收复了并州。

李世民碰到的最大的劲敌是王世充与窦建德。王世充乃隋末东都守将。炀帝死后，王世充成了河南最强大的割据势力。武德二年（六一九年）四月，他自立为帝，国号郑。武德三年（六二〇年）七月，李世民率军进击王世充。他为了打好这场攻坚战，对王世充采取了先行包围的战术，然后再采用政治攻势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。王世充被围困在洛阳，数次向河北的另一割据势力窦建德求救。此时窦建德已自称皇帝，国号夏，他曾南下破黎阳，致使李神通、同安公主、魏徵、李世勣等都被

俘获，他更加骄傲起来。当时他预感到，倘若王世充被唐军击败，他的地位将会随着不稳。为此，他率十余万众支援王世充。李世民命李元吉领兵围困洛阳，自己“亲率步骑三千五百人趣武牢”（同上），用此来扼止窦建德军的西进。李世民的著名的《报窦建德书》就是这时写的。信中讲明利害，劝阻窦建德不要援救王世充，但是，窦建德仍固执己见。二十余日后，李世民见“建德列阵，自辰至午，兵士饥倦，皆坐列，又争饮水，逡巡敛退”，乃下令全面出击，“生擒建德于阵”。李世民回师至洛阳城下，王世充眼见大势已去，遂“率其官属二千余人诣军门”投降。李世民一战消灭了夏、郑两个封建割据集团，使黄河北地区均为唐所占有，至此，唐王朝的统一大业基本完成。以后虽然还有与刘黑闥等的战争，但其规模较小，不能与前三次大战相比拟。

李世民在三次大规模战争中之所以能取胜，其主观原因为：

其一，敢于胜利是李世民在战争中取胜的最主要的原因。李世民所遇到的薛举、薛仁杲父子，刘武周和王世充、窦建德，其兵力都是强大的。年轻的李世民在强敌面前敢于并有信心打败他们，从而使战争获胜。

其二，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，调查和掌握敌方情况。不论在战前，在战争相持阶段，或主力交锋之际，抑敌人溃退之时，他总要亲自深入或靠近敌方营垒，侦察敌方动态，进行认真分析，做到“知彼知己”，以己之长——持雄厚的战斗力，集中打击敌方的弱点。

其三，能采纳正确的建议。当形势十分复杂急迫时，特别是自己一方处于不利地位时，他能广开言路，然后加以权衡，

采纳其中正确的建议。

二

唐太宗的英雄业绩，主要表现在治国方面。他二十九岁即帝位，做了二十三年皇帝。在他执政期间，史称“贞观之治”。综观他的治国之术，在政治、经济等方面，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一、举贤任能。唐太宗明确地认识到，“国之匡辅，必待忠良，任使得其人，天下自治”。（《帝范·求贤篇》）为此，他即位后，仅公开颁布求贤的诏书便有《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》、《荐举贤能诏》、《令天下诸州举人手诏》、《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》、《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》等篇，至于平时与辅弼之臣在谈话中要求推举贤才的，更是数不胜数。他确实做到了任人唯贤，任人唯才，而不是任人唯亲。瓦岗寨起义军中的李勣、程知节、秦叔宝等人，他也一一委以重担。曾经参加过起义军，后归唐给李建成出谋划策的魏徵，在“玄武门之变”后，也被委以重任。唐太宗的以求贤来治国的方针，终生不变。贞观十八年时，他已到了晚年，但他对各地推举上来的人均亲自策问。被策问的人，多为庸才，“莫能对扬，相顾结舌”；太宗考虑到可能是由于在朝廷上过于紧张之故，因而改口试为答卷（“墨对”）。其结果往往是“虽构思弥日，终不达问旨，理既乖违，词亦庸陋。”（《荐举贤能诏》）此事足以说明太宗的求贤若渴的心情，也说明有才学者多被他所任用，剩下的人才而未被录用者，则不多了。

二、善于纳谏。为了使唐王朝巩固，唐太宗经常启发臣下多提意见，以匡正“为君之蔽”。贞观三年大旱，他在《祈雨求

直言诏》中明确提出：“文武百辟，宜各上封事，极言朕过，勿有所隐。”贞观十一年又颁布《大水求直言诏》。贞观二十一年又颁布《求直言手诏》，指出提意见的人太少了，还说：“唯昔魏徵，每显余过。自其逝也，虽有莫彰，岂可独非于往时，而皆是于兹日。”他深切感到自己有过失，就是提意见的人太少。他还深刻地理解“纳谏”的重要性。他在晚年写给太子李治的《帝范》中，把纳谏单独列为一篇，总结出：一个明君治国有成绩，能够纳谏是重要的因素；昏主的“身亡国灭”常常是由于拒绝采纳忠臣的进谏。他以此教育李治当皇帝之后，要时刻想着多听取意见。正因为唐太宗对纳谏的重视，使得他善于听取意见，真正做到了“闻过则喜”。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，贞观时期君臣的纳谏和直谏被传为美谈。

三、轻徭薄赋。唐太宗对爱惜民力方面，是十分重视的。贞观元年七月，他便颁布了《缓力役诏》。诏中要求“每有丁匠之所，常申戒作之司，令其宽大工程，务从闲逸”，一切从节俭出发。必不得已须用民力处，“须慰彼民心”。唐朝初年，关东、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霜蝗之灾，唐太宗很重视救灾工作。仅贞观元年至三年，有关救灾的诏令就有《赈关东等州诏》、《旱蝗大赦诏》、《遣使巡省天下诏》等篇。在这些诏令中，太宗命令灾区官属开仓赈济，并委派中央重要官吏分赴各灾区巡视。邓州刺史陈君宾救灾工作有成绩，他所管辖的州做到了“逐粮户到，递相安养，回还之日，各有赢粮，乃别赍布帛，以申赠遗”。（《劳邓州刺史陈君宾诏》）为此，太宗特颁布诏书以资褒扬，“并令考司，录为功最”。由于唐太宗轻徭薄赋，重视救灾，因而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，“使比屋之人，恣其耕稼”（《贞观政要》卷八《论务农》），这就使得农民逐渐

富裕起来。

四、减轻刑罚。唐太宗重视“轻刑”的措施。贞观元年，太宗对群臣说：“死者不可以再生，用法务在宽简。”（《贞观政要》卷八）又指示臣下：“大辟罪，皆令中书、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。”（同上）对死刑的判决如此慎重，自可减少许多冤案。为了进一步减轻刑罚，他于贞观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颁行了新修订的“新律”，比隋朝旧律减“大辟者九十二条，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”。（《唐会要》卷三十九）其他诸如变重刑为轻刑的还有很多。此外，明显地表现出唐太宗减轻刑罚的是他即位之后的几次大赦。其中有：武德九年八月《即位大赦诏》，贞观四年二月《大赦诏》，贞观九年三月《水潦大赦诏》，贞观十七年三月《久旱简刑诏》等。通过一系列的减刑措施，犯罪的人数有逐步减少的趋势。

五、移风易俗，反浇还淳。唐太宗鉴于隋朝的颓风弊俗，刚即位便颁布《谕崇笃实诏》以倡导移风易俗。诏令中明确规定：“自今以后，内外官人，须相存问，勿致疑阻。有遇疾，递加询问，为营医疗，知其增损。不幸物故，及遭忧恤，随事慰省，以申情好，务从笃实，各存周厚。”在《劳邓州刺史陈君宾诏》一文中，太宗认为邓州的百姓在天灾面前能互相救助，这就可以“变浇薄之风，敦仁慈之俗”。在倡导反浇还淳的社会风气的同时，太宗还极力提倡节俭。贞观元年，太宗“欲造一殿，材木已具，远想秦皇之事，遂不复作”。（《贞观政要》卷六）在历史上，秦始皇等封建帝王为了大修陵墓，不惜劳民伤财，唐太宗却与之相反，主张薄葬。为此，他早在贞观十一年便颁布了《九嶷山卜陵诏》，为身后的薄葬作了安排：“于九嶷之山，足容一棺”。他指出，这样做，一方面有利于

社会风俗“反浇蔽于淳朴”，另一方面，可以避免其子孙后代“尚习流俗，犹循常礼，加四重之祿，伐百祀之木，劳扰百姓，崇厚园陵”。(同上)身为帝王的唐太宗，大力倡导移风易俗，崇尚节俭，对社会风气“反浇还淳”起了积极促进作用。

六、关怀出生之地和创业基地的父老。唐太宗生于关陇，创业的基地主要也在关陇地区。贞观四年十月初，唐太宗回到出生之地武功地区，睹物生情，遂《颁赦岐陇二州诏》。诏文中规定“二州户民，无出一年租”，八十以上的老人另有赐物。贞观十五年六月，他写了《存问并州父老玺书》。信中高度评价了并州父老对当年义兵所做的贡献。文末有“夏序甚热，想各平安，善自颐养，动静奏闻”十六字，反映出他对故土父老的关怀之情，甚为感人。贞观二十年正月，他颁布了《征辽还宴赐父老诏》。诏中说：“既因垂拱之暇，再省创业之方，周历郊原，宛如畴昔，访其故老，已多长谢。”可见从起兵之后，他不止这一次回太原，由文中有“再省”二字可证。一个封建帝王在平定天下之后衣锦荣归，回一次故乡，设宴作诗如刘邦，这不难；难在终生不忘创业基地的父老，关怀他们的生活，不忘他们在打天下时所做出的贡献。唐太宗在这一点上，也胜过了历代的许多创业的帝王。

七、善于与功臣相始终。在封建帝王中，善于与功臣相始终的，当首推唐太宗。贞观十二年，他颁发诏令，命将长孙无忌、杜如晦、魏徵等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画像于凌烟阁，用以表彰其勋德，使之“永贻于后昆”。为了使年老多病的功臣能继续发挥作用，唐太宗还设置了“散官”以备顾问。高士廉、尉迟敬德任开府仪同三司，李靖、萧瑀、魏徵任特进，唐俭、李勣任光禄大夫。与唐太宗共患难打天下和治天下的文武功臣，